

走进世界 · 海外民族志大系

高丙中 / 主编

“习以为常”之蔽

一个马来村庄日常生活的民族志

康 敏 / 著

“习以为常”之蔽

——一个马来村庄日常生活的民族志

康 敏 /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习以为常”之蔽：一个马来村庄日常生活的民族志 / 康敏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8

(走进世界·海外民族志大系)

ISBN 978-7-301-15603-2

I. 习… II. 康… III. 民族志－研究－马来西亚 IV. K338.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26240号

书 名：“习以为常”之蔽——一个马来村庄日常生活的民族志

著作责任者：康 敏 著

责任编辑：丁 超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5603-2/K·0609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pw@pup.pku.edu.cn

封面设计：点石坊

印 制 者：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开本 17印张 278千字

2009年8月第1版 2009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5.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ku.edu.cn

“走进世界·海外民族志大系”总序

凝视世界的意志与学术行动

能叙事才好成事。是表述主体才可能是社会主体。

“到海外去！”

“到民间去”，曾经是一个世纪前中国现代社会发生期所酝酿出来的口号。先有具备学术规范的社会调查，才有社会科学的出现。在少数人一段时间的尝试之后，一句凝结着共同体集体意识的“到民间去”成为1919年之后的知识界的运动，在中国促成书斋学问之外的社会调查之风蓬勃兴起。社会科学诸学科此前在中国主要是课堂传授的西方书本知识，“到民间去”的调查之风呼唤着以中国社会为对象的知识生产，这种知识生产逐渐造就了中国社会科学诸学科。

今日的中国社会科学界则萌发着另一种冲动，一种积聚了很久、压抑了很久的求知之志，这就是：“到海外去”！

曾经，在大家都不能出国的时期，我们在政治关怀上满怀豪情地、当然只是浪漫地“放眼世界”。今天，出国旅行在中国已经大众化了，“看世界”的欲望已如春潮涌动。中国的知识界要做的是以规范的学术方式“走进世界”之后“凝视世界”！

关于社会调查，关于经验研究，“到海外去”预示着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新机会。社会调查的眼界有多宽，社会科学的格局才可能有多大。几辈知识分子在“民间”、在本土开展调查研究，奠定了中国社会科学的当下格局。我们今天到海外去，到异国他乡去认识世界，则是为了中国社会科学明天的新格局。

到海外做民族志

中国人出国，在“镀金”、“淘金”、“挥金”之外，新增加了一个目标，这就是扎在一个地方把它作为一种社会、一种文化来观察，然后写出学理支撑的报告，名之曰“海外民族志”。虽然到目前只有十多个人怀抱着这个目标走出国门，但是它的学术和社会意义却不同凡响。

海外民族志，是指一国的人类学学子到国外（境外）的具体社区进行长期的实地调查而撰写的研究报告。这种实地调查应该符合人类学田野作业的规范，需要以参与观察为主，需要采用当地人的语言进行交流，并且需要持续至少一年的周期。

在西方人类学的正统和常识中，民族志就是基于异国田野作业的研究报告，“海外”是民族志的题中应有之意，所以它们是没有“海外民族志”这个说法的。

人类学民族志的标杆是由马林诺斯基、拉德克利夫—布朗、玛格丽特·米德那批充满学术激情的青年才俊在1920年代出版的著作所树立起来的。他们各自从伦敦，从纽约背起行囊，乘船出海，到大洋中的小岛和“野蛮人”长期生活在一起，完成了《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安达曼岛人》及《萨摩亚人的成年》等经典的民族志著作。他们是第一批靠民族志成为人类学家并进而成为学术领袖的人物。他们的职业生涯成为人类学专业的人才培养的模式。做民族志，总要有充沛的激情让自己想得够远，走得够远。在拥有成千上万的人类学从业者的西方国家，即使后来在国内社会做民族志的人逐渐多起来，但是，到海外做民族志还是一直被尊为人类学人才培养的正途。

但是，对于中国的人类学共同体来说，民族志一直都是一种家乡研究，一种对于本乡本土、本族本国的调查报告，因此，“海外”从来都是中国人类学的民族志所缺少的一个要素，所未曾企及的一个视野，所没有发育起来的一种性质，当然也是今天绝对需要的一种格局。

一般都说中国人类学已经有百年的历史，我们现在才有组织地把田野作业推进到海外，这项迟来的事业让我们终于可以跨越百年的遗憾。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厦门大学、云南大学等具有人类学专业的国内高校正陆续把一个一个的学子送到海外开展规范的田野作业。

中国学人到海外做民族志的时代尽管迟来却已经大步走来！

作为表述主体的共同体

一个共同体，在关于世界的叙事中所占的位置与它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是关联在一起的。民族志是共同体对共同体的表述地位、能力以及主体性明确程度的知识证明。

学术是用文字表达的抽象观念。文字是个人一段一段书写的，但是抽象观念却不是在个人意义上能够成立的。学术是共同体的衍生物、伴随品。——共同体造就学人，共同体产生知识兴趣、共鸣群体（读者），共同体传承学术成果。反过来，学术则催生新的共同体或促成共同体的新生。

具有集体意识的共同体必须是表述者，必须是能够言说自我、言说他人的表述者。民族志是关于共同体表述地位是否存在的证明，是共同体通过特定的表述得以构成或显现为主体的知识途径，是共同体的表述者身份的名片。

虽然民族志的主笔者是个人，虽然民族志的材料来自被访谈的个人，虽然一部一部的民族志都有各各不同的具体内容，但是在集合起来的总体效用上，民族志承载着共同体对共同体的结构性关系。西方与东方的关系、与非洲和拉美的关系，既是由西方所生产的器物所支撑的，由西方的武器所打出来的；也是由西方关于非西方世界的叙事所建构的。这种结构性关系是难以改变的，但不是不能改变的。改变，只能由器物生产的实力和叙事的表述能力所构成的合力来促成。

在前现代，作为表述者的共同体是各自说话，并且主要是自说自话，偶尔才说及他人，对他人的表述和自我表述都难以直接影响他人社会——即使慢慢偶然传播到他人社会了，影响效果也总是以缓慢而曲折的方式发生。

在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的兴起，尤其是民族志的兴起，造成了一种知识后果，这就是群体作为自我与作为他者都被置于同一个表述所组成的社会景观之中，置于西方作为世界中心的这个社会结构之中。从视角来分析这种社会结构的知识关系，西方之所以处于世界的中心是因为几乎所有的观察者、表述者都是从西方往外看的。也就是说，从民族志来分析，作者都是西方学者或者学习西方的学者，而文本内容所叙述的都

是非西方社会的事情；在共同体层次，西方是凝视者，非西方是被观察对象。知识的社会后果早就凸显出来：关于他人社会的叙事不仅在不断满足西方大众的猎奇之心，而且在知识和社会观念上不断强化我群与他群的一种中心—边缘的结构关系——如果我群与他群的相互表述是不平等的，这种结构关系也是不平等的；如果相互表述是极端不平等的，那么这种结构关系也是极端不平等的。民族志的作者在自己的社会中不过是一个普通学者，而在共同体的关系中却支撑着其共同体的优越地位。西方作为民族志叙事的主体，同时也成为普遍主义思维模型的创立者，普世价值的申说者、裁判者，世界议题的设置者。

不过，后现代的世界给人类带来了新的机会。这一波来势汹汹的全球化，也是世界各个共同体、各个层次的共同体的力量和关系的再结构化机会。意识形态批判使西方中心主义得到深刻反省，新技术、新媒体与人口流动使关于他人的叙述不再能够作为一面之辞而成立。更多的共同体能够在国际平台上成为关于世界的叙事者了，世界真正变得紧密了，于是，共同体的代表者对自我的表述与对他人的表述都会同时影响自我和他人在结构中的位置和关系。共同体在全球社会景观中的位置和关系是由代表者的表述和他们参与的表述的总和所塑造的。

中国学者是一个后来的参与群体。“后来”有遗憾，但是后来者必然有不一样的机会和优势。

民族志与中国社会科学

西方人类学家打造了民族志的镜子，用它来审视非西方社会；我们从西方拿来民族志方法的镜子，我们几十年来只拿它观照自己。现在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民族志方法其实是一把多面镜，它可以观照我们，其实更方便观照我们之外的世界。

共同体的社会科学是要靠关于社会的叙事来支撑的。支撑西方社会科学的是关于全球范围的社会叙事，而支撑中国社会科学的是限于中国内地的社会叙事。相比较而言，西方社会科学是以西方为中心看世界，而中国社会科学是以西方的学术眼光看中国。西方学者跑遍世界，当然也跑遍了中国各地，撰写了成千上万的民族志，建立了关于世界的叙事；中国学者也出国，当然主要是到西方国家，但是十分耐人寻味的是，他们把西方只是当作一个大学，那里只是求学的知识殿堂，并不是

他们做田野调查的地方。他们回国才做调查研究。

中国追求现代化一百多年，几辈学者介绍了几乎所有的现代化国家的思想和理论，但是从来没有为国人提供特定的现代社会在社区层次的实际运作的经验知识。现代社会具体是怎样的？现代生活对于个人如何是可能的？中国的社会科学没有认真提过这种问题，中国的人类学也没有当作使命来回答过这种问题，当然就一直没有相应用对象的民族志出现。

毫无疑问；中国的社会科学也是以追求真理、认识人类社会的科学规律来自我期许的。但是，中国在近代以来主要是在政治、军事上纠缠在国际事务之中，在学术上因第一手经验研究的缺乏是处于国际之外的。我们也关心亚非拉人民，也声援发达国家的人民反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正义事业，不过，这大都是在政治、道义上的努力。在知识产业上，中国的社会科学一直都是一种家庭作坊，是一种自产自销的格局：学者们在自己的社会中发掘经验材料，以国内的政府、同行、大众为诉求对象。一些学科也涉及国际世界，甚至以国际社会为论题，但是基本上都是站在（或藏在）中国社会之中对外人信息间接引用与想象的混合物。没有进入世界的田野作业，没有关于国际社会的民族志作为支撑，何来以现实世界为调查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

中国的社会科学，从关于中国、关注中国社会、关心中国发展的社会科学，到认知全球社会的科学，必须从最基本的海外民族志个案积累开始。中国学界的海外民族志将逐步建构中国对于世界的表述主体，中国将从民族志观察的对象转变为叙述世界的主体。在国际社会科学中，中国从单向地被注视，发展出对世界的注视，以此为基础，作为表征社会知识生产关系之核心的“看”就必须用“注视—对视”（也就是“相视”）的范畴来对待了。获得社会知识的单方面的审视总是被抱怨包含着轻视、敌视，但是“对视”以及作为其产物的相互表述的民族志将在国际社会之间造成“相视而笑”的效果，也就是费孝通先生所期盼的“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结果。

以中文为母语的人口与中国人口都在世界上占最大的比重。中国学人和中文加入到关于世界的实地调查研究中来，世界社会科学无疑将因之大为改变。更多的参与者、更多的视角看世界，看彼此，被呈现出来的世界将会大不相同。

展望中国社会科学新格局……

因为心中有春天，我们看见嫩芽会欢欣。

海外民族志训练是未来的人类学家出师的汇报演出。没有人指望其中有多少大师的代表作，但是它们无疑都是地区研究的一个区域的开拓性著作，更加确信的是，它们的作者是中国人类学乃至社会科学在国外社会大展经验研究的开路先锋，是为我们的共同体在知识世界开疆裂土的功臣。它们的作者从熟悉的家园到远方、到异国他乡而去，拓展了中文世界的空间。它们从社会知识生产的源头而来，就像涓涓溪水从雪山而来，假以时日，配以地势，必将汇聚成知识的海洋。

我们年青的人类学者已经走进世界，在泰国、蒙古、马来西亚、印度、澳大利亚、美国、德国、法国、俄罗斯、巴西、香港、台湾等地，深入一个社区进行起码一年的参与式社会调查。他们会带动越来越多的学人参与，世界上也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中国学界的关注点。他们陆陆续续地会完成自己的民族志成果，用中文书写当前世界各种社会的文化图像。他们的民族志个案今后可以组合成为对于发达国家的社会研究，对于金砖四国的综合研究，对于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和基督教社会的比较研究，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我们特别期盼对于非洲大陆、阿拉伯世界、太平洋众多岛国的研究，特别期盼对于周边国家日本、韩国、缅甸、越南的研究……

海外民族志在中国的广泛开展，将改变中国社会科学单一的学科体制。中国社会科学按照学科划分为政治学、法学、经济学、教育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人口学、民俗学……，分属不同学科的学人要开展合作，并没有学科体制的平台。民族志比较发达的那些知识共同体，如美国、日本，在学科分列的同时还有一个地区研究（area studies）的体制。在学科与地区研究并行的体制中，大学教授分属不同学科的院系，但是相同的地区研究兴趣又把不同院系的教授联结起来。这个方向的发展是以关于国外社会的民族志为基础的，但是却不是人类学家单独能够操作的。我们刚刚开头的海外民族志事业对于中国社会科学派生“地区研究”的机会却是靠整个学界才能够把握的。

海外民族志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基础知识领域之后，中国社会科学在学术上也会更上一层楼。海外民族志除了在共同体层次上、在整体上对于社会科学的重大意义之外，在技术层次、操作层次对于社会科学的

影响也会是很实在的。从业者只在中国社会做调查与同时在海外社会做调查，代表着不同的眼界、不同的事实来源。更开阔的眼界对于议题的选择、对象的甄选、观念的形成都会更胜一筹。学术的精进总伴随着寻找更广泛的社会事实来源；由国际社会经验比较所支持的论说可能更加有力。

相对比较紧迫的是，海外民族志是疗治中国社会科学严重落后于时代的病症的一剂良药。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学者却只在本国的社会中做实地调查。中国把大量资源投入到外语学习上，却没有几个人是计划学了语言去国外社会做调查研究的。中国的商品拥挤在全世界各地，可是它们总是置身在陌生的社会被人用怀疑的眼光打量、挑剔，中国学界没有能够及时为它们创造各个方面都能够熟悉的知识环境。中国大众旅游的洪流已经从国内漫延到国外，在世界上浮光掠影的观光所型塑的世界观是极其偏颇而危险的。所有这一切都在期待中国社会科学的世界眼光。

凝视世界的欲望需要走出去的意志来展现。人类学者是共同体的眼珠子——它们被用来看世界，看社会，看社会世界，看世界社会。有眼珠子就能够看，有心才能够凝视。人类学者也是知识群体的脚板子——它们要走很远的路，走很多的路，走陌生的路，也就是走没有路的路。有了这样的人类学者群体，一个共同体的社会科学才能走得够远，看得更远。

高丙中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北京大学人类学专业海外民族志项目负责人

2009年7月4日

序

康敏博士的专著《“习以为常”之蔽》是一部很值得一读的外国民族志，很了不起。该书反映了近年来中国东南亚研究中一个非常可喜的重要转向：即中国大学的博士生开始走出国门，奔赴东南亚国家从事田野调查研究。在此之前，虽然不乏海外中国留学生也到东南亚实地调查，收集资料，但一般都是受国外大学的派遣与资助，专门为国外大学学位论文而准备；同样，虽然中国大学也有部分学者、甚至博士生，曾创造条件到东南亚国家进行这样或那样的研究，但一般或为短期肤浅粗放式的观光考察，或为长期交流学习式的进修访问；虽然中国前辈著名学者如人类学家林惠祥和社会学家陈达，也曾在东南亚从事过长期的实地考察，并有专门著作问世，但那毕竟是在战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就像台湾著名的人类学家李亦园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赴马来西亚柔佛州的田野考察一样，毕竟与内地大学和学者的境况不可同日而语。就社会科学在新中国半个多世纪来的独特历史遭遇和中国对外国地域研究的整体水平而言，像康敏博士那样从事为期近一年的专题田野调查，从学术的原动力到财物资助，完全靠自己筹措而不用依靠海外援助，其困难之大，可想而知；其闯劲之足，令人刮目。正因为如此，如果说北大社会学与人类学系高丙中教授麾下的博士生团队可谓开了风气之先，一点不为过。康敏博士论文的成功实践，从另一个侧面也展示了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包括学术交流）近十多年来突飞猛进的飞跃发展和广阔前景。

康敏博士的学术勇气与进取心还体现在其博士论文研究课题的独到选择上。在中国，长期以来东南亚研究很大程度上等同于东南亚华人研究，此点与东南亚地区当下知识生产的族群化的专业分工，竟非常相似；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狭隘的和亟待纠正的失衡与无奈。值得欣喜的是，作为祖籍来自中国福建漳州的华人博士生，康敏当初并没有按自身所谓地缘与族群的惯例优势条件选择从事马来西亚华人研究，而是反其道而为之，选择了一个更具挑战性的非华人研究题目，即马来人回教村社研究，而且把田野调查的地点选定在马来人占绝大多数、回教党势

力影响最大的北马吉兰丹州农村。鉴于学界激烈竞争的市场专业分工，鉴于她作为中国年轻的女性身份，鉴于她在田野调查之前从来没有到过马来西亚的个人背景，仅此选题的本身便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也不禁让人为她捏了一把汗。然而，康敏博士竟然最终顺利完成了她在马来西亚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2006年顺利通过答辩，并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将其大作修改出版。

康敏博士的专著副标题“一个马来村庄日常生活的民族志”揭示了全书的主要内容。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人类学课题，也是一个非常中国化的研究定位。就前者而言，该书通过对学名为仪村的马来村庄田野调查，描述了仪村日常生活中的时间安排、空间结构、性别权力，以及个人与社会、宗教和国家的关系等方方面面的课题，揭示了蕴含于仪村“日常生活”与“习以为常”文化主题背后的价值法则和权力关系，堪称一部标准的外国民族志。就后者而言，该书明确的定位可以说是一位刚迈出国门的中国年轻学者从外国人的视角、以中国学界和读者为对象而写就的、一部富有中国特色的东南亚民族志。或许正因为如此，一个明显印象是全书内容通俗风趣，文字简洁流畅，文风跳跃而富个性和张力，没有学院派惯常的深奥精细的理论架构，也没有学究式程式化的精雕细琢般的专业分析，凡仪村的日常生活，从饮食起居、生老病死，到身体服饰、宗教伦理，再到社会、国家和族群文化认同，依作者自己亲身的观察、体验和感受，平平常常，一一娓娓道来，加以解读串联。虽然个中议论有时难免过于朴素而富感性，虽然个别专业学者对此或许难免有些微词，但它很适合中国读者的口味，相信大多数中国读者都会喜欢阅读此书，并和我一样为康敏博士所取得的成就而骄傲。

“初生牛犊不怕虎”，康敏博士在自己的学术职业生涯中已经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值得祝贺，我期待着今后她会有更多高质量的东南亚研究论著问世。是为序。

吴小安

2009年仲夏

谨识于燕北园

目 录

引子：不寻常的马来西亚

第一章 “习以为常”之蔽（导言）

- 第一节 “常”的意味 /009
- 第二节 “习以为常”与所谓“传统” /016
- 第三节 权力的遮蔽 /021
- 第四节 去蔽行动 /024

第二章 仪村概况

- 第一节 马来西亚和吉兰丹州基本情况介绍 /029
- 第二节 “传说”中的马来人 /035
- 第三节 走进仪村 /038

第三章 日常生活中的时间安排

- 第一节 一天五次礼拜 /048
- 第二节 一年两个节日 /052
- 第三节 一生三次仪式 /064
- 第四节 时间设置中的文化认同 /070

第四章 日常生活中的空间结构

- 第一节 住宅里的空间布局 /079
- 第二节 甘榜里的公共建筑 /094
- 第三节 居住在世界的中心 /106

第五章 关于性别的社会常识

- 第一节 驯服身体 /115
- 第二节 马来人的日常服饰 /119
- 第三节 服饰的变化 /128
- 第四节 日常生活中的性别关系 /135
- 第五节 性别平等与政党之争 /146

第六章 个人与社会

- 第一节 称谓 /154
- 第二节 家庭关系 /161
- 第三节 亲属、邻里与社区 /179

第七章 从教徒到国家公民

- 第一节 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与新常识的普及 /195
- 第二节 当旧常识遭遇新常识 /200
- 第三节 绝望的爱情：一个典型个案 /214
- 第四节 穆斯林？马来人？马来西亚人？ /219

结论 /225

参考文献 /238

附录 /253

说明 /256

后记 /258

引子：不寻常的马来西亚

2004年2月9日，吉隆坡天气晴好，但我的心里却如阴云密布。昨夜一宿无眠带来了疲惫的后遗症，与亲人的离别依然让我伤感，而没有人接机的事实更让我感觉到自己好像是一叶孤舟被抛进了大海。我该如何面对这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呢？

大约15:45，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班机降落在吉隆坡国际机场，比预知的16:05提前了很多。飞机降落时，一排排郁郁葱葱的棕榈树在窗外飞速闪过，远处是一片片墨绿的山林，视线所及皆是富有生命力的绿色，这多少让我打起了一点精神。刚走出机舱，一种湿润而温暖的气体立刻包围了我，带着泥土和草木的芬芳，我想起了地处中国东南沿海的家乡。深吸了两口气，我告诉自己，这里已经不是遍地枯黄、春寒料峭的北京，甚至也不是我所熟悉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而是一个即将从这里开始自己的人类学研究的地方，我多少应该拿出点未来的人类学家的样子，勇敢地、充满自信地、微笑着去面对异文化，“culture shock”不是应该很令人期待吗？

然而，当我在机场的摆渡车上看到那个身披藏红色僧袍、皮肤黝黑的光头老汉，那个头发留得很长、蓄着一嘴胡子、身材巨胖的年轻男性，还有那个板着脸孔、辫子又黑又粗又长、肤色同样很黑的印度中年妇女时，我突然感到有一点害怕，这与之前的茫然无助是完全不同的。在那一刻，我有如离开大地的树木、断了线的风筝，安全受到了潜在的威胁，我仿佛没有了过去，失去了未来。直到我抵达马来亚大学，见到了素未谋面的一个朋友的朋友，当我们开始用中文交谈时，我和我熟悉的过去才又重新取得了联系，一条通向未来的道路也变得隐约可见。

在随后的几天里，各种新鲜的经验扑面而来，虽然我在出国前已经大量阅读了有关马来西亚的各种文献，但真的面对她时，她依然显得那么陌生。于是我像一个好奇的孩童似的，来不及思考，先忙着感受和记录。

这里到处都显得那么宽绰。在号称“森林中的机场”的吉隆坡国际

机场，一大群乘客一下飞机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根本没有形成什么“人流”，我只能依照机场指示牌上的英文摸索前进。连接机场和城市中心的特快列车上空空荡荡，乘客寥寥无几。在马来西亚最著名的马来亚大学，学生宿舍基本上都是两人一间，房间宽敞得不需要把床分上下铺或者睡在自己的桌子上方；到教室上课或到图书馆自习用不着抢位占座，博士生还可以享受单间自习室的待遇；校园里空旷而静谧，有山有湖，却没有一波接一波的游客，也没有喧闹嘈杂的小集市，在校园内比较偏远的宿舍区，女生们回去晚了甚至要特别注意人身安全。吉隆坡城里的住宅大概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种叫“排屋”，就像较富裕的中国农村统一盖的那种房子（比如韩村河或华西村），规划整齐地一排排分布，每一家都独门独户，有自己的庭院，只有两层楼，很像是北京房地产广告里的“联排别墅”（或者“townhouse”）；一种是公寓，也就是高层住宅楼，这里的高层住宅楼一般都带有游泳池和网球场；还有一种就是独立式洋房，有前庭后院，占地面积不等，建筑风格也各异，可以充分体现出房主的喜好和财富。在人口如此密集的都市里，大多数人家还都能住上“有天有地”的房子，着实让人羡慕！

这里的一切也显得那么丰富。这里的色彩是丰富而明亮的：天空瓦蓝瓦蓝，路边的行道树、草坪绿得仿佛都能滴下油来，还有长开不败的鲜花，五颜六色，姹紫嫣红。这里的建筑物是个性鲜明的：或者是简洁明快的阿拉伯式清真寺，或者是红墙尖顶的欧式大楼，或者是装饰无比繁复的印度寺庙，或者是四平八稳、庭院深深的中式祠堂，又或者是高耸入云、闪闪发光的现代化摩天大楼……这里的人种和族群也很丰富：有黄皮肤的马来人、印尼人、泰族人、华人，有褐色皮肤的印度人、锡克人，有白皮肤的英国人、阿拉伯人，还有很多是漂亮的混血儿。这么多种族的人们长期居住在一起的结果，就是使得马来西亚的文化呈现出异常丰富的特性。在这里生活，你每天都可以听到许多不同的语言：在市场里多数华人讲广东话或闽南话，跟政府官员打交道要讲英语或马来语，电视里经常播放载歌载舞的印度电影，街道上的指示牌或许没有中文，却不能没有阿拉伯文；每天都可以看到标记不同文化的装扮：马来妇女的锢笼装^[1](baju kurung)、印度妇女的纱丽(sari)、锡克男人缠得紧紧的大头巾、阿拉伯男性的白色长袍、方格头巾和女性的黑色面纱；当

[1] 本书第五章第二节有详细介绍。

然还可以品尝到亚洲各地的美食：什么马来沙嗲(sate)、黄姜饭、椰浆饭、印度拉茶、各式咖喱、海南鸡饭、台湾肉骨茶、日本寿司……，真可谓应有尽有。从北京来到吉隆坡，感觉就像家里的电视一下子从黑白电视换成了高清数字彩电。

在这里，我也遇到了很多想不通的“怪事”。比如这里的气候是那样的潮湿闷热，学生们出门都不关电风扇，一天要冲好几次冷水澡，可是马来妇女却还能够忍受从头包到脚的打扮，她们不仅包着头巾，穿着长衫长裙，长袖里戴着手套、凉鞋里穿着丝袜的也大有人在。另一方面，这里的室外温度很高，一般都在30摄氏度以上，但只要是安装了中央空调的室内场所，温度却都很低。即使是诸如马来亚大学图书馆这样空间开阔的地方，温度竟然会低得需要大家穿长衣。很多马大的学生上图书馆时要专门带件长袖外套。有一个中国北方来的留学生跟我说，穿短袖T恤只能在图书馆里呆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要呆一个下午或一整晚的人，棉衣都得穿上，膝盖上还要盖条毯子。有一次我在他的自习室见到他，他穿了一件很厚的夹克衣，一付冬天的装扮。不仅是图书馆，在一些办公楼、商场里，工作人员往往都是穿着全套西服、打着领带上班。我常常在想，这里的人是因为想穿得多，所以空调温度调得低呢，还是因为空调温度调得低，所以得多穿点？

这里的银行、邮局从不在节假日里开门，他们和政府机关一样，每个月的第一周和第三周工作五天，第二周和第四周工作六天。在国内已经习惯于在节假日里跑银行和邮局的我常常因为没有注意到当时是该月的第几周而跑冤枉路。每次吃闭门羹时我就会想，他们为什么不干脆一点，要么每周工作五天，要么工作六天呢？

马来人出售饭菜的方式也非常奇怪。在学校食堂里，由马来人经营的摊位一般是在桌上将各种主食、菜肴铺摆开，由顾客自己拿着盘子挑选（包括品种和数量），装好之后到收款台由收款人估价，然后交钱。^[1]对我而言这种经营方式简直不可思议。因为估价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很大，假如有人想占小便宜，做点手脚，估计收款人也根本看不出来，而某位顾客与收款人的关系的亲疏自然也会大大影响到一顿饭的价格。这种估价的主观性似乎是很普遍的。有一次，朋友带我到移民局去办手续，当时需要复印一份文件。我们找到移民局里的一个复印点，一开始

[1] 由华人经营的摊位一般是固定好每份餐的价钱，由老板打饭菜。